

〈拉普蘭儒學宣言〉專號導言

張崑將

Kun-Chiang CHANG

(專號主編，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)

關於〈拉普蘭儒學宣言〉(Lapland Manifesto of Confucianism)，此為北歐三位學者——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的羅多弼(Torbjörn Lodén)、芬蘭拉普蘭大學的馬迪(Matti Nojonen)，以及芬蘭國際事務研究所的高玉麒(Jyrki Kallio)於二〇二一年共同撰寫的一份儒學宣言。該宣言一方面重申儒學作為「人文主義」哲學的核心價值，另一方面則關注儒學於當代所面臨的發展困境，企圖透過批判過去與當下的誤解與錯誤詮釋，保存儒學之「菁華」，盼其「重光」，以恢復儒學於現代社會中的實踐可能性。¹

為達此目的，〈宣言〉論及範圍甚廣，首先從儒學之「自我」論、人性論與理學的歷史辯證出發，強調儒學是一種對個人主義、自由、平等與科學持開放態度的哲學體系。其次，宣言亦嘗試對「君子」概念進行現代詮釋，將其界定為明於智、守於義、任於責的「現代公民」，期許儒家之世界公民能以民主精神實踐「天下為公」的普世價值。然而，〈宣言〉亦謹慎指出，須防止君子之反面發展為民粹主義，避免再度墮入「御用儒學」的陷阱。

綜觀全文，〈宣言〉關涉諸如人文主義、主體自覺、普世精神、公民責任與政治儒學等議題，啟發了多方學術對話與反思。本期特輯所收錄的六篇回應文，即對〈宣言〉提出了各具洞見的批評與補充。

¹ 〈拉普蘭儒學宣言〉的完整的中英文稿，可以在拉普蘭大學中的網站中瀏覽。
<https://www.ulapland.fi/EN/Webpages/Nordic-Network-on-Chinese-Thought>

首先是黃俊傑與蔡振豐兩位教授之回應，他們不約而同地關注儒學於二十一世紀的現代性問題。黃俊傑教授提出三項關鍵討論：（1）儒家之「自我」與「修身」課題；（2）儒學與民主之關係；（3）儒學的「現代相關性」。此外，他將本次〈宣言〉與一九五八年由唐君毅、牟宗三、徐復觀與張君勱聯名發表的〈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〉對照，比較兩者在歷史背景與思想重點上的異同，補足了歐洲學者在新儒家脈絡上的闕如，並呈現東西方學者在儒學詮釋上的共通與差異。蔡振豐的回應同樣聚焦於「儒學現代化」議題，指出〈宣言〉對此概念界定不清。他特別指出，〈宣言〉實際的批評對象是「大陸新儒家」，並深入比較雙方立場異同。他認為，〈宣言〉在解釋朱熹之「理」、批判超越主義，以及理解個人主義等面向上，皆存在偏誤或混淆。尤其是在批判大陸新儒家缺乏「自我」價值的論點上，舉證不足，反而落入強調集體責任的傳統模式。此篇回應對〈宣言〉的深化修正提出了重要觀察。

另外，李明輝與林維杰兩位教授則集中探討〈宣言〉所提出的「人文主義」概念。李明輝對於〈宣言〉所認為荀子天論之見解比孟子、朱熹的天論對當代「道德主體」的立場更有助益的闡釋，關於這一點，特別提出商榷意見並指出這是錯誤的解讀。李明輝指出，若論儒學中蘊含的民主精神，孟子較荀子更具啟發性，應予重視。林維杰則系統比較〈宣言〉與一九五八年新儒家的〈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〉，認為二份宣言一隱一顯，換言之，當代港台新儒家的宣言是一種「隱含」的「中國儒學宣言」（因為「中國文化」還包括道家與佛家），主要回應西方的政治與科學的時代挑戰；而歐洲漢學家此份宣言則是「直接」顯諸儒學，重新審視內聖外王的原初理想，以區隔後代的「御用儒學」，直接回歸儒學精神的人文主義。以上李、林兩人的回應文均指出〈宣言〉在人文主義詮釋上仍有諸多待商之處。

另有兩篇由韓國學者所撰的回應文，分別從韓國儒學的發展脈絡出發，拓展了〈宣言〉於東亞儒學視野中的應用與詮釋。金渡鎰與洪麟所合撰的〈當代儒學重構的方法與方向：以韓國為例〉，一方面批判大陸新儒家將儒學重構為「賢能主義」與「集體主義」的傾向，另一方面則以韓國儒學

的發展經驗為例，補充〈宣言〉所未言明的重構方法論，並提出儒學經典現代詮釋的具體建議。另外，安承宇的〈周易的資源循環哲學〉則聚焦於〈宣言〉關注的儒學現代應用問題，特別從《周易》探討資源循環與生態永續的思想資源。文章從「資源論」與「循環論」兩方面解析《易經》對當代環保倫理的潛在貢獻，將傳統經典轉化為現代社會可用的哲學資源，為儒學「古為今用」提供新方向。

整體而言，這六篇回應文均對〈宣言〉提出溫和而深刻的批評與建言，反映〈宣言〉在詮釋與定位上尚有許多值得深入商榷之處。然而，作為歐洲漢學界首度發表的儒學共同宣言，其歷史意義不可低估。若與一九五八年新儒家的宣言相對照，儘管兩者所處時代與問題意識不同，卻同樣面對儒學於現代的「轉換性創造」課題，顯示儒學如何面對並應對時代挑戰，始終是未竟之事。

〈宣言〉的提出，恰處於儒學復興的全球關鍵時刻，不僅呼應中國內部的思想復興，也回應全球民主制度面臨的民粹化與脆弱化問題。北歐學者藉由儒學這一東方智慧傳統，試圖為世界公民提供一種新的倫理與實踐哲學。在此意義下，〈宣言〉所強調之「存儒學之菁華，望儒學之重光」，誠需諸多具批判精神的繼承與實踐，方能避免重蹈過去「御用儒學」的覆轍。也正因〈宣言〉出自歐洲漢學者之手，方能從西方視角重新審視儒學之全球意義。以本期專號為平台，藉〈宣言〉之倡議，展開東西學術對話，不僅促進儒學於當代之再生與轉化，更有望開拓儒學在二十一世紀的普世價值與實踐新境界。

